

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部弹词所依据的小说底本，可能不是清初毛宗岗评本《三国演义》，而兴许是明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我们曾把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、毛宗岗评本《三国演义》和弹词《三国志玉玺传》三种书进行对阅，弹词的夹白文字，大致与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相同，而去毛宗岗评本较远。因为《三国演义》中删除“嘉靖本”中的一些字句、繁文，弹词中仍予保留，这说明了弹词改编者所依据的底本有可能是“嘉靖本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改编的年代还可能向上推早。我们准备在整理中加以认真考证。如果改编为弹词的时间，能确证不是清初，而是明代后期，那将对于中国俗文学史的研究，亦是有意义的事。

.....

谨祝

撰安

郑州市图书馆

童吉永 张万钧 周树德

1983年3月25日

秋瑾佚诗辨

郭长海

最近，秋瑾的佚诗有了不少新的发现，这些佚诗不仅扩大了《秋瑾集》的范围，而且，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秋瑾思想的各个侧面，这就为我们研究秋瑾提供了新的资料，故而引起了史学界和文学界的注意。不过，读了樊鹤同志的文章《秋瑾的佚诗》（《文献》第九辑）以后，却使我们失望。

首先，我们来考查一下樊文存录的四首诗。很明显，前两首为一组，后两首为一组。前后两组诗是唱和之作，后两首题目上都有一个“次”字，即前两首诗的次韵；在诗句上也是如此：前后两组诗的韵脚相同（只有第三首第二句的“亚子玉魂芳”一句中“芳”字应作“香”），说明这两首诗是次前两首诗的韵而作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第三首题目上标出来的《次芳·诚·稼·日晚眺》，这就告诉我们：前一组两首诗的作者是“芳·诚”，（不过，题目上把“秋”日晚眺误为“稼”日晚眺了）据此，我们可以肯定此四首诗的第一、二首作者是芳·诚。现在已知秋瑾的名、字、号中，根本没有“芳·诚”这么一个名字。再查秋瑾编过的《白话》杂志、《中国女报》等，也不见用这个署名写的文章。秋瑾生前发表过文章的《女子世界》，以及秋瑾就义后，为纪念秋瑾而发表过秋瑾遗作的刊物《神州女报》、《女报》等，也不见这个署名，所以，我们可以肯定，芳·诚并不是秋瑾，而是另有其人，也就是说，前两首诗的作者并非秋瑾。

其次，我们研究一下后两首诗的作者是不是秋瑾。樊鹄同志据此四首诗断定：秋瑾曾经入川组织过革命活动，而且，还是在四川新都桂湖写的这几首诗。看来，根据尚不充分。从目前接触到的材料来看，没有一个人、没有一件事、没有一篇文章可以证明秋瑾曾经到过四川，包括她的亲友，以及熟悉她生平事迹的同志。如果秋瑾曾经到过四川，她们（他们）岂能不知？这些纪念文章都写于辛亥革命之后，对秋瑾的革命活动没有必要秘而不宣，相反，倒是应该张大其事，大书而特书；当然，也不会是遗漏，因为，秋瑾如到过四川，当然不只和王觉吾一个人有联系。其时，同盟会四川分会的人，应该与秋瑾相熟稔，可是，这些人竟也从来没有谈起过秋瑾曾来四川的事。因此，入川之说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。

第三，我们从秋瑾后期活动的时间来看，也很难说后两首诗

是秋瑾所作。单从时间上来看，后两首诗作于秋天是可信的。哪一年秋天呢？秋瑾一九〇三年秋天在北京，一九〇四年秋天在日本东京，一九〇五年秋天也在日本东京，一九〇六年秋天在上海。显然，一九〇六年以前，秋瑾是不可能有机会去四川的。樊鹤同志说是一九〇六年的秋天，我认为，也不可能。原因是，一九〇六年农历七月，秋瑾到上海筹办《中国女报》。农历八月，在上海虹口祥庆里，与陈伯平试制炸弹，不慎爆裂，伯平伤目，秋瑾伤手，几乎为巡捕所缉，幸而证据毁灭，得以从容离去，后暂回绍兴小隐。农历九月，过崇德，访徐自华女士，以徐氏姊妹父丧，前来问吊。农历十月，再至上海。这个时期，秋瑾不存在去四川的可能。此后，秋瑾即奔波于沪、杭、绍之间，并曾先后三下金华，秘密联络各地会党，酝酿发动革命。说她此时去四川，则更不可能，一则时间已近冬月，再则时间甚紧，不容她远去。一九〇七年春天，倒是有一次西行的机会。但也仅只限于湖南一隅，往返时间已经一月有余，如果再去四川，恐怕还得耽误些时间。从秋瑾一九〇七年春、夏之间的活动来看，她也不可能有这样长的时间在外久居。

最后，我们还可以从诗的风格来看一下，这两首诗也不似秋瑾之作。秋瑾后期写诗，一反前期那种纤弱、伤感的内容，而时时流露出一种奔放豪爽之气，激昂而又酣壮，含蕴着一种郁闷不平的气概，与樊鹤同志所引两诗不同。再说，秋瑾一生写诗，很少和作，除前期与吴芝瑛、后期与徐自华两位女友有几首外，与其他人唱和，为数甚少，今见者仅一、二首而已。这正像她的为人，总是独立、创新、进取，很少追随别人，傍人门户，因此，她不可能和一个远在四川的人去作酬唱之作。

综上所述，我认为樊鹤同志所提供的四首秋瑾佚诗，归之于秋瑾名下是不恰当的！

一九八二、五月初稿 六月改定